

经济 · 社会与文化

经济随笔集

张军 著

张军

复旦大学出版社

张军

经济随笔集

张 军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徐惠平

责任校对 张利勇

经济·社会与文化：张军经济随笔集

张 军 著

出 版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国权路 579 号 邮政编码 200433)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复旦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9.375

字 数 160 000

版 次 1998 年 5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 000

书 号 ISBN 7-309-01992-X/F·446

定 价 15.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向本社调换。

5212/107

前言与鸣谢

收在这本集子里的文章是我1992年以来利用“闲暇”所写的经济随笔的一部分，绝大多数都已公开发表过。在编辑这本集子的时候，我对个别文章的标题做了一些改变，但大部分文章仍然保持了它们原有的题目。在这些文章当中，70%是我为《经济学消息报》和《万科周刊》撰写的专栏文章，其余20%的文章是我从其他的报刊上挑选出来的，另有10%的文章是尚未公开发表的。这些文章长短不一，题材多样，风格迥异，有的轻松活泼，有的严肃认真，可能反映了我在不同阶段所关注的不同问题，甚至也反映了我在不同时间所具有的不同心理状况。

在这本集子即将付梓出版之时，我必须感谢早在1991年就敦促我动手写作经济随笔类文章的《经济学消息报》的主编高小勇先生。后来我于英国期间又在高小勇先生的逼迫下担纲了《经济学消息报》

1992年度的“专栏作家”，从此我似乎就以“专栏作家”的身份与《经济学消息报》结下了不解之缘。1993年我还被读者评为《经济学消息报》的“优秀专栏作家”的称号，这当然就更增强了我写经济随笔的信心。于是，当深圳万科公司的《万科周刊》主编全忠和施建辉（现已调离）希望我在他们的周刊上开个专栏时，我自然就点头答许了。不用说，我现在也要感谢《万科周刊》的朋友对我的支持。还要感谢曾经为我的随笔文章提供发表机会的许多杂志和报纸的编辑，尤其是《上海证券报》以及《财经》丛书的张志雄先生。

最后，我要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的高若海先生，他为这本文集提供了出版的机会。本书的责任编辑徐惠平先生对我选编这本文集给予了极大的鼓励和支持，我相信他的编辑技巧当然还会为本书增色不少，在我明天即飞赴英国伦敦和丹麦哥本哈根之际，对徐君申表谢忱。

张 军

1998年3月11日志于上海

目 录

前言与鸣谢.....	1
1 伦敦遐想：'96 中国经济学回眸	1
2 经济理论的影响：我们真的可以忽略吗？ ...	9
3 转变中的中国经济学家的角色	16
4 蟋蟀与洗衣粉：我们的世界为何 五彩缤纷？	22
5 世界末日：经济学家可以说不！	28
6 我们相信市场吗？	33
7 保险公司的悲哀：“柠檬的问题”.....	39
8 什么是腐败？	47
9 什么是“贫富”？——从财富分配看 收入分配	56
10 商标，市场与商业道德.....	64

11	道德与经济学:近年来的一个发展·····	69
12	文化变迁与经济发展:一个简短的评注·····	74
13	道德与西方经济学·····	85
14	道德与博弈论·····	91
15	国家与市场:英国公共部门的改革·····	100
16	诺思再论制度变迁·····	107
17	什么是社会的契约?·····	113
18	礼券在行动:私有化进程中的俄罗斯人···	119
19	中国经济应该有多大?·····	121
20	“自我履约”理论的回声:评关于中国农业 合作化与农业危机(1959—1961)的一场 国际争论·····	127
21	原苏联经济增长的误区在哪里?·····	135
22	增长方式:谈谈经济学家的研究·····	140
23	“过渡”与“战略”:《中国的奇迹》读后·····	157
24	经济学教科书的价值在哪里?·····	164
25	“政治人”与“经济人”:《公共选择》 译后感述·····	170
26	科斯与科斯定理·····	180
27	庇古的传统与科斯世界·····	195

28	“公地的悲剧”可悲吗?	206
29	比较组织的经济学.....	214
30	我们为什么需要非赢利组织?	221
31	经济与法律:背后的逻辑一致吗?	229
32	经济学家应该做什么?	243
33	社会科学与达尔文主义.....	253
34	进化论或退化论.....	260
35	何以发展中国的经济学?	264
36	经济学的今天和明天.....	270

附录:人物点评

阿莱斯.....	275
霍韦尔莫.....	281
马克维茨,夏普和米勒	285

1 伦敦遐想： '96 中国经济学回眸

这几年我差不多每年都来伦敦。但去年（1996年）我来过两次。这一次我是在隆冬岁末来到寒冷的伦敦的。与前几次一样，我总是喜欢一个人坐在空荡的火车上前往我最喜欢的南方乡村 SUSSEX，寻找我和我的家人曾经留下的足迹。不过，这一次坐在火车上我头脑中却一直在思考中国经济学这样一个大的问题。我离开上海之前，北京的张曙光先生专门在电话中嘱托，希望我能在离开上海之前留下我对他主编的《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的评论，我实际上没有照办，却偷偷地飞离上海来伦敦了。其实我何以能一走了之？事实证明我只是把这个任务带到了英国而已。

说来也巧，1993 年底，也是这个时候，我和樊纲

坐在从英国的南方城市 BRIGHTON 开往坐落于乡间的 SUSSEX 大学的火车上，樊纲告诉我，他和盛洪、张曙光等其他几个人数月前在北京成立了一家民办的研究所，有意着力推动中国经济学之发展。后来回国我又成为这家研究所的特邀研究员，参与了他们的不少学术活动，获益匪浅。研究所这几年频频行动，除了编辑出版了旨在倡导和推动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文集《中国经济学》(1994, 1995) 之外，他们还举力组织开展了一项大型的案例研究项目，致力于中国经济改革过程的制度变迁研究，《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 1 集) 就是这一工程的初步成果。尽管我曾参与过对这些案例研究的讨论和评论工作，但是现在作为一部集子出版，对我却仍然具有一定的吸引力。读到它，总是免不了想到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和中国经济学家的使命。

一位从事汉语研究的年轻博士告诉我，当今汉语语言学的权威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日本。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钱（经济实力）。其实，在经济学方面，类似这样的话，我听到的就更多了。我确信，钱的问题不可以全部解释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状况与水平。张曙光教授曾在经济研究所的成立大会上雄心勃勃地说，中国的改革问题只能以中国经济学家自己的研究为基础，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官办的研

究所不景气，民办的研究所又大多从事开发和咨询业务，无意学术研究，尽管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已在引进、学习和研究现代经济学的过程中开始起步，进一步的路子如何走，是摆在中国经济学家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

当前，在中国经济学家内部，寻求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的努力值得我们进一步讨论。有一种建立在某种强烈的“中国因素”基础上的乐观主义倾向和意识，在其背后，我隐隐约约地感到一种难以言状的文化意义上的情结：中国的经济学应该是从中华文化中衍生出来的完全不同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东西，他们相信，中华文化因素的引入，就能够使经济学成为本来应该是的那种经济学，使经济学更像经济学。在西方的经济学经历了最近半个世纪的举世公认的准科学化发展并行将进入 21 世纪的新纪元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学家流露出这种心声当然是很可贵的。这种心声反映了中国经济学家对中国古典哲学的崇敬。它说明，中国的经济学家在了解和学习了现在西方人主导的经济学以后，开始有所警觉。其原因是，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崛起唤起了中国人对中华文化传统的珍视，当他们在我们的祖先那里找到了现在被称为“西学”的经济学精神的时候，当他们思考欧洲启蒙思想家的自由主义思想

和中世纪经济学家的道德威力与中国古典哲学的道法自然的精神之流源关系的时候，便油然而产生了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和超越感。然而，在这里，他们的文化意识的节奏似乎刚刚迭起，却走得已经太远。他们找到了现代经济学的中国因素和中国文化的思想火种，精神上有所依傍，但很快却把中国文化的这种包容性视为对现代经济学发起根本性挑战的理由。事实上，如果存在着挑战的话，那么，对现代经济学的真正挑战将不会是来自隔膜着的文化间的差异和遥远的相对优越性，而是来自对现代经济学的主动融合。带着文化上的差异和优越去“融入主流”正是真正体现中国文化“天下主义”精神的途径。既然经济学的发展是由问题导向的(problem-solving)，那么，中国经济学家要融入现代经济学的主流，当然首先就需要提出中国自己的问题来。

对中国的经济学家来说，我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能否去从先哲们的伟大著作和思想中寻求可与现代经济学的精神比拟的精神慰藉。不是那种虚无主义的傲气，而是进入主流的行动、在过去的20年，中国毫无疑问正在经历她的文明史上几乎罕见的社会和经济的制度改革。她的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社会结构正在发生的巨大变迁就是我们经济学

家今天所面临的最大的研究问题。

《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1集)就是中国经济学家“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的行动。这项研究工程的基本目标是“以案例的形式,进行经验实证研究,对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过程进行实际描述和理论分析,以便回答以下问题:中国发生了什么?是如何发生的?还将会发生什么?现有的理论能否解释?能否以及如何创造新的理论?中国的经验对其他国家有无和有何借鉴意义?”(《案例》第15页)。收入这部案例研究集里的9篇论文基本上涉及一个主题,中国经济的制度变迁以及产权关系的变革过程。研究的内容十分丰富,每个案例都是一个典型的“特征性事实”,在研究和论文的表达方式上多以制度关系的分析和概念分析为主,“特别强调理论逻辑上的主体主义和契约主义的思想方法”(《案例》第316页),反映了60年代以来在西方发展起来的现代制度经济学(如产权和交易成本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影响力。这些常常被冠之以“新制度经济学”的各种理论之所以受到中国经济学家的偏爱,其原因被认为是,这些理论“不仅自身具有很强的理论魅力,而且对中国的具体问题和过渡过程的问题有着很强的解释力和指导意义”(盛洪主编,《中国的过渡经济

学》1994,第6页)。事实上,用制度的分析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或者说把中国的经济改革处理为制度的变迁过程几乎成为大多新一代中国经济学家唯一的方法。这一倾向在中国青年经济学家研究中国改革过程的论文集《中国的过渡经济学》(1994)一书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在当时,几乎没有人反对把改革过程定义为一个制度变迁和产权变革的过程,由于这一共识,中国的青年经济学家开始运用制度变迁理论来思考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分配和与之相连的产权变化。增量改革,体制外改革,双轨过渡,计划权利的交易以及买入型变迁等等概念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中国经济学家提出来的,这些概念的提出并不是经济学家“闭门造车”的凭空想象,而是反映了中国经济学家对中国改革过程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思考。现在,这些概念被广泛地应用于对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成为体现在《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1集)中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这是中国经济学实质性的进步。

如果说《中国的过渡经济学》“还存在着一个极为致命的缺陷,即:它还只是停留在一般理论的讨论上,很缺少中国改革实践的经验材料的支持”的话(《中国的过渡经济学》第12页),那么《中国制度

变迁的案例研究》(第1集)对中国经济学的贡献就在于,它把理论实证和经济实证的方法结合起来,“理论实证是一种逻辑演绎,而经验实证却不仅仅是一种经验归纳”(《案例》第9页)。张曙光先生说:“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和现代化必须在方法和方法论上有所前进和突破,其中,开展和重视案例研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案例》第6页)。

不过,与《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一样,《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1集)显然还有待于在经济理论上作出更大的贡献,提出这样一个批评并不是苛刻的表现。事实上,这部案例研究的成果本来是可以作出更大的理论贡献的。这里还是一个如何融入主流经济学的问题。中国的过渡经济学要能融入主流经济学,要能对主流经济学作出贡献,提出中国的问题是其一,还需要在方法论上逐步突破以“制度分析”为主导的方法导向的意识,在研究中国经济改革的过渡过程和制度变迁过程的方法论上,采取更加开放的态度。从整体上说,《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1集)的方法论仍然过分地拘泥于西方现成的制度变迁理论(尤其在个别的案例研究上表现得相当明显)。尽管张曙光先生在这部案例研究文集的“前言”中也说到,案例研究也离不开均衡概念和均衡分析,但还是认为,“对制度变迁过程进

行实证分析的最好方法是案例研究，而不是以均衡概念为基础的计量分析”（《案例》第13页）。不过，在我看来，似乎并没有理由认为制度分析一定是研究制度和制度变迁问题的唯一的和最好的方法。事实上，新古典的方法，作为现代主流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常常被运用于对制度变迁问题研究和对制度变迁过程的理论构造。在这方面，中国的某些经济学家已经有所尝试，例如我们有的经济学家在国际上发表了对中国产权变迁问题做的“形式化”工作，对中国农村的生产制度从集体合作生产向家庭承包制的变迁所做的理论化工作，从方法论基础上来说，都是新古典意义的。他们通过把“交易成本”概念引入正统经济学的“环境”，无疑对制度变迁的理论作出了贡献，但同时也为中国经济学融入“主流”作出了贡献，而他们的研究又何尝不是一种典型的“案例研究”呢？

2 经济理论的影响： 我们真的可以忽略吗？

在我很多搞经济理论研究的朋友当中，有不少后来转到政府研究部门和政府决策部门工作去了。我经常问他们这么一个问题：你们从研究经济学转入治理经济之后是否对“理论联系实际”有什么“新说”？

回答常常是，过去研究的东西与现在所做的事情基本上没有必然的联系，甚至会有冲突。政府官员头脑中思考的问题和经济学家思索的问题是完全两样的。如果这种体会是真的的话，那么，我们长期挂在嘴边用以要求理论家的叮咛“理论联系实际”这句话就需要仔细推敲了。

经济学家是医生吗？

其实，我与政府官员打交道也有许多年，当有